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

主编：高楠

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

宋伟 著

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转型震荡中，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这一重大的社会转型给中国文化思想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它拥有过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经历过徘徊与困顿，更迎接着挑战与危机。作为这一全新时代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在场者、创造者，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光荏苒后，我们能够在何种意义上重返文化事件的发生现场，演绎思想论争的纷纭繁复，对其进行再度的阐释和反思，并从中找寻面向未来的经验与教训，这无疑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

主编：高楠

当代社会转型中 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

宋 伟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宋伟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8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高楠主编)

ISBN 978 - 7 - 5039 - 5429 - 0

I. ①当… II. ①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4598 号

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

主 编 高 楠

著 者 宋 伟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429 - 0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总序

高楠

中国正经历着文学与文论大规模建构的风暴，先前的一套稳定的模式，在质疑与批判中松动、解构、重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质疑与批判的主体力量，又恰恰是在先前稳定的模式中确定其学术基业的学者，他们是在进行着营垒中的反叛，他们揭竿而起。他们所质疑与解构的，恰恰是他们的学术本体。那么，他们何以进行这种近乎于自戕式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精英防线在作了一番艰难的守护后终于溃决；大众喧嚣不已的呼声经由当代传媒的鼓噪，发出大潮奔涌般的强力，把文学推上市场的旷野；文论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文学骤变，时而激愤，时而避闪，时而失语，又时而逐流；历史的回声被现代性狂欢阻断，后现代的晨钟又以回声的方式震动历史；全球化进程把大洋彼岸的季风带入焦渴的理论荒丛，民族特色的寻觅又使那季风转化为本土的春潮……这样的描述性话语并非表述激越的诗意，它只是文学与文论状况的诗意表达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表述中，一个理论追问再次袭来——它们何以会如此？

这一切，都须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求解。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声势浩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很多方面，包括无数的生活的枝梢末节，也都在潜移默化地变化。人们身在其中，因变而变，随变而变。当随着时光推演这样一步步地在变中前行时，人们只觉得每一步都和前一步不同，却感觉不出一个巨大变化的轨迹。然而，经过三十年步步前行，回首走过的路，才深刻地感受到这

是怎样的一段陡转崎岖的路，又是怎样的一段意义重大的历史。而这一代人又正是这一段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思考者、创造者。这使从事学术研究的我们感到有责任记述这一段历史，求解这一段历史，阐释这一段历史。其目的不是留下我们的思考——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有思考，却未必都是有价值的思考，而是留下这段思考的历史，是思考着的这段社会转型期的历史。

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变革，当然也可以说，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其牵动无所不在。社会转型就其深层根据而言，是既有社会控制、协调、管理的体制及支撑着这一体制，使之成为这样的体制而不是另一种样式的体制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系统性的动因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体中，由于后者是一种历史性的物质力量，是基础性的、发动性的、无可阻挡的力量，因此它具有充分的实现性，而此前它所支撑的社会体制，则是使其实现或阻碍其实现的被实现或不被实现（被否定）的条件性存在，即是说，社会体制相对于社会的原生动力而言，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条件。这种关系，用经典的说法，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经典的说法是更具概括性的说法。当体制的条件状况在总体上成为社会原生动力或物质性力量的压抑条件状况或否定条件状况时，前者的总体性的改变就无可避免。这时，任何局部修补都无济于事，整体性的体制调整，便成为社会转型的基础性需求。而顺应这种原发性物质力量需求向既有社会体制发起变革性思考及运作的人，便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这样的先行者见于代表性思想，便是启蒙家，见于代表性行为表现，便是改革家，见于政治发动，便是社会转型的领导者。时下中国正进行着的社会转型，便是应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的需求，由国家决策部门所政治地发动的，由启蒙的思想家们所精神地或意识形态地阐发的，由众多领域的改革者所实践的历史与时代在矛盾中不断融合的多元化转型。

随着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变革而相继发生的，是社会结构的变革，这一变革是既有社会体制向各社会领域延伸的细化结构的解构，同时也是在体制改革带动下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这样的解构与建

构过程因其细化而成为人们切身于其中的过程，每个人都被带入其中并且在其中成为过程的构成者，每个人又在过程的构入中成为具体的实践者。这是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运作者，大家在实践理性的运作中，变更着先前的行为模式，松解着先前的行为系统，大家又在行为系统的变动中与规定着实践行为取向的社会价值体系相遇，与新构着的行为模式相遇，同时，也与因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而引起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相遇。这些在社会体制与结构的变革中与每一个人相遇的外部力量，或每一个人都在其中的外部构成性力量，经由实践内化为人们的相应于社会转型的思想意识，人们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据此而思考、而判断、而评价、而言说议论。思想家们在思想上着启动这一过程，又凝敛与提升这一过程，由此形成着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理论。

这套“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是国家教育部十一五“211工程”学术立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文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的集结。该项目从文学与文艺理论的角度进入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理论建构与系统阐释。像其他思想理论领域一样，文学及文论的理论思考也是一个历史的前承后继的过程。当然，思想理论的前承后继并不是线型延续的过程。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提出并示范式地运用的谱系学方法，在后来者的进一步发挥与阐发中，已成为一套有很大学术沿用价值的方法论，这种价值来源于它合于历史的发展状况，并因此成为开启与思考历史过程的根据。谱系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认为历史的延续性不是连续的、绵延的，而是断裂的、跳跃的，历史的延续性是实现于具有某些基本相似点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跳跃式回放、复制与基本相似点的递变中。如先秦时期的社会转型、初唐时期的社会转型均引发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个人与他人与家国社会的关系，两次转型的发力点与着力点都与这个问题密切关联，并且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延续性——人的个体能动性被强烈地激活、肯定，人的被禁锢的思想得以自由释放，不过这种被激活被释放的个性自由却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转入以平等为自由尺度的独立的个性发展与张扬，而是被导入复杂的人伦

之中，强化着家国共体的人伦秩序。由既有人伦基点出发经社会实践转入个性激发，再将这激发的个性能量回落于进一步建构的人伦秩序，从先秦至初唐的两次社会转型跨越数百年的历史断带，实现着社会的基点性延续。

基于这样的历史延续性的理解，本选题把先秦至今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作为关注与学术取向的要点，把不同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文学状况作为研究对象，提示社会转型与文学与文论的内在联系，这样，文学与文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如诗言志问题、诗的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问题、诗的情感本体性问题、诗法及技巧问题以及诗的乡土母题、人生序位母题、生命体悟母题、爱情母题等，都跳出就这类问题去思考求解这类问题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是将之放入各自所属的社会转型时期，深入到社会转型的体制、结构、行为系统、思想意识层面，抓住期间的历史批判力量，不同社会层面的结构系统与行为系统的演进过程及演进形态，梳理并阐释与相应的历史批判力量、系统演进过程及其形态相应的思想意识，揭示这些社会因素是如何以其转型变化影响文学与文论，形成既有文学与文论的批判与解构，并进行新的文学与文论的提升与建构的。

文学及文论，有自己的系统性，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也有自己的演进变化规律，深入进去，进行文学与文论的自身研究，这是此前经常被用到的研究方式，亦即向文学及文论本体内敛的研究方式。然而，文学及文论的自律同时又是他律的，而且是他律的自律，它总是被规定的，规定它们的是它们在其中的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后者是它们得以如此的条件，是它们被特征化的语境。这种情况决定着文学与文论的任何状况的出现，任何命题、判断及范畴的形成与提出，都需要在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寻求动因与根据，这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这更是原本如此的规定。既然如此，与本体内敛的研究方式相对应，就必须向着社会文化系统进行外延式研究，使文学及文论问题，在其由社会文化系统所织就的周边网络中得到构成性研究，并由此揭示其何以如此是何以如此为的根据。本套系统著作，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把文学与文论的各种基本问题及焦点性问题，

放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转型的条件性背景中予以求解。这样，文学及文论与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系统、社会思想意识的关系便得以还原，便走出了传统的偏重于文学及文论的封闭的、孤立的研究状况，具体化着有机整体的、动态的、互动生成的研究方法。

还须指出的是，本套系统专著，在其研究与著述中，有意识地强调其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立足点，从当下的时代现实出发，坚持问题意识，确认在当下社会变革中文学与文论所面临的难点与焦点问题，在社会转型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通过向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在本体内敛式研究的同时，努力开阔视野，进行条件性与语境性的外延式研究，以此求得文学与文论的历史问题的时代解答；同时，又把这一解答置入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形成历史与当今时代的互生互动。就拿全球化进程来说，这是具有当下特征的社会进程，它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代表性体现。对于这一进程的学术投入，便使得文学与文论的既有的各种问题都获得更为广阔的背景参照，而在这样的背景参照下，既有问题便发生了视角、意义、侧重点以及提出问题的方式的变化。比如传统的意境问题，此前所进行的多是其意蕴考据及破解性的研究，而在全球化视野中，与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相比，它成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论的传统特色乃至根基特色的问题，它充分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所特有的、有机整体的、浑融的、流动变化的、互动互生的思维方式及表述方式，于是，意境这一传统问题，便在当下时代高度上从文化根基与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角度被强调地提出。

本套系统专著的标志性成果见于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与文论的代表性问题。这十个方面即：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论建构、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西论中化与中国文论主体性、中国文论与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及传播形态、中国现代时期的文论建构、历史变革中的文学经典研究、历史转型期的文体演进、春秋转型期孔子的礼乐思想与文学观。这十个方面，均抓住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均突出文学与文

论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性并将之作为思考的要点，均在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学及文论的历史关联性中确定有历史代表性的文学与文论命题，并且均在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时语境中对这些命题予以论证和求解。这里涉及史论兼用的问题、社会文化的历史追问问题、文学与文论的理论基点问题、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特色开掘问题、文学及文论传统的当下转换问题、文学及文论的现代性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下文学与文论建构的焦点问题，每一步思路展开都富于挑战性与开拓性，每一部成果的产生都显现着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都验证着建构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学术功底与智慧。

目 录

绪论 文学理论的转型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时代精神史	1
一、步入现代性:“新时期”划时代的历史定位	2
二、激变的年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特征	9
三、转型期研究:作为一种方法的时代精神史	16
第一章 主体的觉醒:新启蒙运动与文学主体性	26
第一节 历史劫难中的人性泯灭与复活	28
第二节 步履艰难的主体性行程	35
第三节 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困境	64
第四节 回归主体性哲学的学理深度	72
第二章 异质的叛逆:现代主义与文学先锋性	82
第一节 历史废墟上的精神放逐与反叛	84
第二节 现代派艺术话语的合法化论争	99
第三节 现代派在中国的曲折之旅	111
第四节 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国叙事	125
第三章 美学乌托邦:审美主义与价值关怀	141
第一节 历史理性主义的质疑批判	142
第二节 价值追问与终极关怀	154
第三节 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境遇	166

第四节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争	190
第五节	转型期的新世纪美学研究	216
第四章	解构的力量:后现代主义与多元差异	232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	233
第二节	后现代性视域下的先锋文学	240
第三节	后现代转向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249
第四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266
第五节	时尚的后现代与批判的后现代	282
第六节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	288
第五章	众神的狂欢:大众文化与文化研究	297
第一节	大众文化的崛起与人文精神的失落	298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与话语谱系	303
第三节	大众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理论	315
第四节	资本现代性:资本时代的艺术价值反思	328
后 记		333

绪论 文学理论的转型研究： 作为一种方法的时代精神史

1913年，法国作家夏尔·佩吉在谈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世界历史剧变时曾说：“世界自耶稣基督时代以来的变化还不及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大。”^①今天，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变化还不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化大”。20世纪80年代，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年，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幕，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断言，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三十几年的历史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崭新时代的历史坐标，标志着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真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时段。显然，这里所说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在意味着一种崭新时代来临的同时，也意味着历史在此正发生着重大的转型变革。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历史的重大转型期。

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震荡中，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这一重大的社会转型给中国文化思想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它拥有过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经历过徘徊与困顿，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与危机。历史的进程曲折复杂，不可能一帆风顺直达彼岸，尤其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旧与新、古与今、左与右、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反动与进步、中国与西方等等矛盾冲突，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直接，或隐蔽，或迂回，或变通，各种矛盾冲突构成了历史进程中的紧张关系。历史仿佛被某种巨大

^① 转引自罗伯特·休斯：《新的冲击》，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的力量所激活，风云际会、震荡冲突、断裂剧变，由此形成除旧布新、拨乱反正的历史情势。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阐释历史转型剧变时期各种矛盾冲突所产生的复杂局面，寻求这一时期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以从中揭示其现实意义和未来启示。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星移斗转，流年似水，抚今而追昔，顾后而瞻前。回顾与反思这段历史，无论对于现在还是未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来说，三十几年的光阴流转，不过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曾经的事，走过的路，已经渐行渐远，所有的一切正在成为流逝的过去。作为这一全新时代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在场者、创造者，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岁月后，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眼光来回顾和反思这一历史时段，并从中找寻面向未来的经验与教训，这无疑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一、步入现代性：“新时期”划时代的历史定位

在康德看来，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而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必将历史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时期”作为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时段，与其说它是一个可以用机械时间来计算度量的特定年代，不如说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此生成一种崭新的历史发展向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然而，应该从何种意义上认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应该如何描述和定位这一时期的历史地位、性质及特征，以真正彰显其“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无疑，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需要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展开宏大的历史视野，描述和定位“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历史性质及其历史特征。

毫无疑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方向性和整体性的转型变革，即划时代的历史性转折。

首先，这一历史地位的判断或定位，是基于“现代性”视域而展开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问题，并从发展理论的角度将其定位于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其中代表性的有炳正、衣俊卿等学者。炳正强调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总体的、全面的和根本性的变迁的过程，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社会转型问题。社会转型一般是指社会类型总体、全面和根本性的变迁。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许多学者把社会转型概括为以下诸方面的转型：（1）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2）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3）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4）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5）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6）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①确实，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整体性、根本性的社会变迁，同时也必然是多方位的转型变革，这就要求我们在复杂的多方位转型变革中，把握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变革及其总体趋势。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转型变革的历史性质，也就是说，应该从何种层面和意义上定位这一转型变革的历史地位？衣俊卿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一文中指出：“中国社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这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存而亲身感受到的、不容置疑的现实。这表明，缠绕我们民族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终于开始从理论层面切入现实层面。中国社会正在以市场经济的建构为中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中国民众正从传统深处走出来，与新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会面，从而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向现代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转型。……尽管不同研究者的视角和切入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发展理论的宗旨是使中国社会真正获得现代性或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科学和民主为内涵的理性化与以自由和平等为内涵的个体化。”^②

上述观点更多地基于“发展理论”的理路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在方法与视角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现代性问题尤其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进一步展开，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提供了更为有效的解释视域。在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的理论规定性问题上，我们倾向于

① 炳正：《从匮乏走向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哲学动态》1995年第2期。

② 衣俊卿：《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哲学动态》1995年第2期。

从现代性的层面出发，将转型问题理解为一个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转换的问题。也就是说，“转型”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应该从现代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视域来看待和理解当今时代的历史性“转型”问题。

虽然，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可以将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变革时期都理解为“转型”时代，但这种理解会导致将“转型”问题泛化为一个“去历史语境化”的形而上学命题，而一旦将“转型”问题进行“去历史语境化”的处理，就必将导致对这一问题的当代现实性的遮蔽，从而丧失了“转型”研究的当代问题意识及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更强调基于“现代性理论”的路向，来理解和定位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问题。

从现代性的层面，以中国走向现代化为转型变革的总体战略发展目标，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构性翻转为时代变革的风向标，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历史演进脉络，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具有理论定向的方法论意义。由此，我们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历史阶段，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

作为一种历史观念，“现代”、“现代化”、“现代性”已经成为描述和理解人类社会现代历史的一种方法与视域；走向现代，进入现代，实现现代化，已经构成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现代性工程”。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何为现代性？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①现代性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②吉登斯侧重于在社会组织建构的层面来指认现代性组织化、社会化、世界化的历史过程。在他看来，现代性起源于欧洲，并伴随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时空分延）而扩张到整个世界。吉登斯的观点虽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嫌疑，但基本符合现代化世

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

界历史发展的事实。从西方的历史看，现代性是内部生成的，我们将其称之为“内生型的现代性”；而从非西方的历史看，现代性是外部殖入的产物，我们将其称之为外部殖入型的现代性。与西方内生型现代性不同，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外殖型现代性”^①。两种现代性虽同属现代性历史的范畴，但其历史效果却呈现十分不同的形态。对于现代性进程所必然经历的艰难历程来说，外在殖入型现代性较之于内在生成的现代性，所经历的震荡、曲折、苦痛、磨难的强度要大得多，其前行的道路上布满曲折的复杂性。但无论是内生型现代性，还是外殖型现代性，步入现代性已经成为难以抗拒的世界历史进程。

其次，这一历史判断或定位，是基于“中国现代性”历史语境而展开的。

现代性具有全球化蔓延扩张的本性，产生所谓外在殖入型的现代性问题，就中国语境而言，也就是中国现代性的历史难题。虽然，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时段及演进过程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有观点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即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言外之意，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中国完全有可能自行走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遗憾的是，这种推论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假设，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法假设的。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的殖民化过程中，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拖入其中，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嵌入性特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护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恩格斯在论及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时也认为：“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

① 有学者将西方现代化视为“原生型”，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视为“诱发型”；也有人将其分为“原发型”与“后发型”。参见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黄山书社2008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① 现代性的殖民使传统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慨叹世界时局时说：“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② 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结构，同时也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

众所周知，近现代中国历史已经见证了这一充满血与火的艰难历史进程。从此意义上说，百年来历经磨难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就是外在殖民型现代性所带来的一部充满苦难的历史。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对此历史事实，我们无需以妄自尊大的心态，保守封闭，拒绝进入现代性历史进程；也无需妄自菲薄，以现代性西方模式为绝对标准，丧失自身选择探索的历史主体地位。外在殖民型现代性构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而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则直接导致中国近百年来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异常艰难曲折。《中国现代化历程》一书认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复杂曲折性在于，在 20 世纪不同阶段中以不同的形式一再启动，具有启动、中断、再启动、再中断，最后实现转型的特殊历史性：“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三次政治变革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客观意义和资源积累，它们的启动意义都是不完整的，实现方法都是软弱无力的，最终结果都是不成功的，而只有辛亥革命才实现了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尽管辛亥革命对早期现代化的启动程度是有限的，但却有效的，它使中国现代化形成了进入启动阶段的基本条件。”^③ 这种艰难曲折性表现为中国现代性在生成发展中，经历了启动、中断、再启动、再中断，最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型的复杂历史过程。

据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即中国在近百年来步入现代性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无论是洋务运动、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无不与现代性问题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关联。在这里，有渴望，也有悲观；有艳羡，也有怨恨；有追求，也有拒斥；有建设，也有破坏；有保守，也有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85 ~ 286 页。

② 转引自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 页。

③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 1 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0 页。